

近年来国家图书馆古籍特藏文献采访工作概述

□ 谢冬荣 国家图书馆古籍馆

采访工作是指图书馆工作人员通过购买、捐赠、拨交等途径,入藏馆藏所缺文献。它是图书馆的基础业务。国家图书馆古籍馆负责管理的古籍及特藏文献逾三百万册件。这些文献经过百余年的积累,见证数代国图工作人员的辛勤努力,是国家图书馆的重要馆藏,也是中华五千年文明的重要见证。近年来,古籍馆工作人员坚持发挥不遗余力的搜采精神,注重采访各类古籍及特藏文献,无论是从数量,抑或是质量上,极大地丰富了国图馆藏。笔者现对2011—2022年间采访工作进行简要概述,在总结过去工作的基础上,对今后更好地开展古籍特藏文献采访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

一、采访文献数量统计

根据古籍馆2011—2022年业务报表统计,12年间采访古籍特藏文献127564种305897册件,其中:善本104种4572册件、新善本1658种3070册件、精装精印319种649册件、手稿4714种25831册件、外文善本1781种27220册件、敦煌吐鲁番资料8587种10794册件、金石拓片15059种20729册件、中文地图17486种33528册件、外文地图7679种9385册件、年画665种778册件、老照片709种11231册件、少数民族语文古籍80种265册件、普通古籍5626种22763册件、契约文书37082种41755件、方志11040种13281册件、文史资料2139种2304册、家谱12045种72970册件,以及其他801种4772册件。由于少数民族语文新书刊经常涉及移交、退库等情形,上述统计中未包含该类文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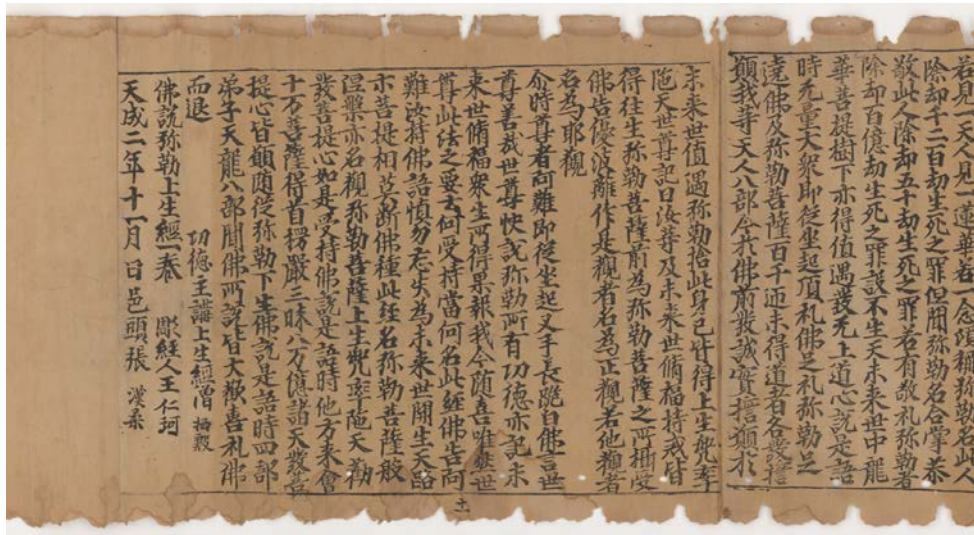
二、采访工作成绩总结

纵观这12年的采访工作,所取得的成就可以从如下四方面加以概括:

(一) 珍贵文献纷纷入藏

珍贵文献或具有重要的研究资料价值,或在出版印刷史等方面具有标志性的价值。珍贵文献的入藏,直接关系国家图书馆的藏书品质。近些年,古籍馆着力争取各种珍贵文献的采访与入藏,举其重要者有:2011年入藏稿本《明渤海孙氏积善堂题赞手卷》;2013年国家文物局拨交卷2272至2274卷“模”字韵的“湖”字一册《永乐大典》;2014年分两批入藏28种28册彝文古籍;2015年入藏西夏古籍61种61册件,同年4月又入藏三件早期雕版印刷品,其中五代后唐天成二年(927)刻本《佛说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一卷》仅比咸通九年《金刚经》晚59年,为国内已知有纪年的最早雕版印刷品;2017年入藏《文津阁四库全

书样本》1种1册；2018年分两批入藏以官府绘本为主、与中法战争等相关的舆图文献129种143册；2019年国家文物局拨交郑振铎等抢救流散香港文物往来信札；2020年入藏法文本《论语导读》、唐雕版印刷梵文《陀罗尼》等4种4函；2021年入藏宋版《营造法式》残叶1叶，等等。这些珍贵文献在国图的服务与研究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后唐天成二年（927）刻本《佛说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一卷》

（二）特藏文献增长迅猛

古籍馆所藏特藏文献种类多样，大多收藏历史较久。过去12年，特藏文献的数量都取得了较大幅度的增长，特别是以下几类特藏文献：手稿文献，目前藏18000余种，这一段时期就增长4714种；家谱文献，2011年以前不到5000部，过去12年增加12045种，增长两倍多；契约文书，此前馆藏有数千份，2008年正式设立专藏，后开始重点采购，这12年间的采访量十分惊人，达41755件；此外，新善本、中文舆图、金石拓片这些年增长的速度也十分可观。

（三）收藏范围与种类进一步扩展

古籍馆在重视传统纸本文献采访的同时，也重视收藏相关的实物、档案类、数字类文献。例如，先后从福建采访近千块古籍、家谱的雕版实物，填补了我馆在这方面的空白；分三批购藏15286件黄河水利档案，必将有助于对黄河的深入研究；入藏十余件卷轴形式的祖先像，丰富了家谱藏品的形态；外文善本近年入藏一些早期文书类文献，进一步拓展了外善的收藏范围。

（四）文献捐赠成为采访亮点

捐赠一直以来是我馆补充馆藏的重要途径。近些年中，捐赠在采访工作中尤为突出。从文献类型来看，手稿的采访以捐赠为主，涉及周太玄、杨先健、冯仲云、塞克、菡子、许宝衡、阮章竞、柴德赓、杨凡、张君勱、杨晦、顾随、周作人等等众多近现代及当代著名人物。其他各类文献也多有捐赠，例如：王佳捐赠道教古籍文献349册、柴剑虹捐赠敦煌资料1025册件等等，为该类文献中数量最多者。此外，近些年古籍馆还多次接受海外友人、华人华侨的捐赠，例如：2011年菲律宾著名华侨庄万里的“两塗轩”藏书4148册由其家属捐赠入藏国图；著名侨领、美籍华人陈灿培多次手提肩扛，千里迢迢从美国将其收藏的二战时期资料、地图等珍贵文献带回国内，捐赠国图；2018年为纪念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日本

前首相、时任永青文库理事长细川护熙向国图捐赠其收藏的 4175 册汉籍。这些捐赠文献极大丰富了国图的馆藏，而捐赠者的义举不仅为一时美谈，而且必将彪炳史册，为后人所称道。

三、采访工作简要分析

之所以能够取得上述成就，笔者分析与以下三个因素有关：

（一）书主藏家的充分信任

著名藏书家周叔弢先生在捐书给北京图书馆的时候，曾说过：“捐书如嫁女儿，要找个好婆家。北京图书馆善本部由赵万里主持，他是真懂书爱书的，书到那里可谓得其所，我是放心的。”在采访工作过程中，我们能够深切感受到书主藏家们对国家图书馆的充分信任和对工作人员的大力支持。有时为了鉴定的需要，书主藏家直接就把珍贵文献寄存在国图，方便专家和工作开展。有时因为工作流程和规章制度等因素，书款迟迟不能支付，大家都给予了充分的理解与包容。相声演员称观众为他们的“衣食父母”。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书主藏家也可以称为我们图书馆采访人员的“衣食父母”。离开他们的支持，我们的采访工作将无法开展。

（二）采访人员的敬业奉献

在工作过程中，我们的采访人员表现出来的热情、周到的服务，较高的专业水准，以及令人敬佩的敬业奉献精神，赢得了书主藏家们的一致称赞。2012 年古籍馆从福建藏家手中购入近 15000 册件的文献和实物，运书回的时候，正值盛夏，近百个装满文献和实物的箱子，从上车到住宿地再到火车上，中间要来回装卸数次，每一次大家都是大汗淋漓、浑身湿透；2014 年前后，民语组全桂花老师等人前往贵州采访彝文古籍文献中的种种经历，每每提及，都令人肃然起敬。正因为有了工作人员的敬业奉献精神，我们的采访工作方才能够做到有声有色、成绩显著。

（三）相关部门和人员的大力支持

古籍馆的采访工作离不开相关部门以及各级领导及工作人员的大力支持。三件早期雕版印刷品所需经费较大，时间比较紧，各级领导的及时审批、大力支持使得此事最终得以成功；《永乐大典》、郑振铎等抢救流散香港文物往来信札、法文本《论语导读》能够得以入藏国图，与相关政府部门的大力支持密不可分；每次参加拍卖会，往往留给报文流程的时间较短，此时就经常需要下班后、甚至周末催促相关职能部门及馆领导加快审批进度，而大家也都予以理解、及时签批，从而确保竞拍得以参与。

四、新采访藏品服务情况

古籍馆采访入藏的古籍特藏文献，在做好保存保护工作的基础上，更主要的是提供服务，为人所用。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是阅览服务，这是最基础的服务，很多文献入藏不久即为读者所关注，例如：2013 年入藏的新善本《宪政会纪始事略》《中国民主宪政党史》《婚书》、2014 年入藏的普通古籍民国三十八年（1949）传抄本《衡华日记》等已提供读者阅览服务；第二是展览展示，近年来举办的一系列展览中，如 2014 年至 2016 年的“馆藏名家手稿精品展”、2016 年的“民族记忆、精神家园——国家珍贵古籍特展”和“红色记

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5 周年馆藏文献展”、2017 年的“不朽的长城——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馆藏文献展”和“钢铁长城——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九十周年馆藏文献展”、2018 年至 2019 年的“旷世宏编 文献大成——国家图书馆藏《永乐大典》文献展”等，都涉及使用新入藏手稿、新善本、拓片、普通古籍等文献，而 2019 年 1 月我馆与央视网等举办的春节楹联活动中，使用了 2013 年入藏的普通古籍清光绪十二年《十三经对联大成》；第三是文献出版，珍贵文献通过影印出版化身千百，更便利地为读者所用，《中华泰山文库》《毛泽东著作早期版本图录》《江苏文库》《近代出版史料长编》等文献出版项目中都有使用新入藏文献；第四是文献数字化，日本前首相、永青文库理事长细川护熙向国图捐赠其收藏的 4175 册汉籍，涵盖经、史、子、集四部，其中不乏我国早已失传的重要典籍。为此，我们将该批汉籍全部进行数字化，发布在“中华古籍资源库”中，提供全球公众免费查阅服务；第五是其他方面，例如文创开发使用了 2016 年入藏的外文善本 Culture des Muriers（《桑蚕辑要》）。此外，古籍馆及时对新入藏珍贵文献进行修复，并编纂出版“国家图书馆古籍修复案例丛书”，间接为学界提供服务，目前已经出版的有《国家图书馆藏西域文献的修复与保护》（2017 年）、《国家图书馆三件早期雕版印刷佛经修复与保护》（2019 年）、《国家图书馆藏法帖修复与保护》（2021 年）。为了揭示与宣传新入藏文献，古籍馆每年在四期《文津流觞》中单设一期采访专辑，详细概括当年采访工作的情况。《文津流觞》电子版在国图官网上有发布，便于读者了解当年采访信息。

五、采访工作面临的问题与困难

当然，古籍馆在采访工作方面也仍然面临着不少问题和困难，主要有以下三点：第一是经费问题，受疫情影响，近几年古籍馆用于补藏古籍和特藏文献的经费逐年下降，受此影响，能够购买的文献数量也急剧下降，以往一般每年入藏数量在 2—3 万左右，2022 年仅有一万多一点；第二是馆里规章制度的局限，目前国图有规定，要求当年采访的文献必须当年完成编目，这固然是为了更好地发挥文献价值、服务读者，不过因为采访数量的增多，相应的人力没有增加，势必会影响编目进度，尽管这些年馆里给予了很大的宽限，但是这也让热心采访的工作人员略感心有余悸之忧，在加大采访力度方面有所顾忌；第三是国家政策的影响，例如 2022 年国家文物局发布《关于加强石刻文物拓印管理的通知》的文件，其目的是为了加强和规范碑刻石刻文物拓印管理，确保文物安全，这当然是好事，只是对今后我们采访金石拓片可能会产生不利影响。

六、今后采访工作的意见和建议

近年来，随着各地对古籍保护工作的重视，以及古籍特藏文献收藏日益受到藏家的关注，国图古籍特藏采访工作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为了今后进一步做好此项工作，不断增加我馆的古籍特藏文献藏量，笔者提出如下几条意见和建议，以供参考：

第一，着力确保购书经费。经费保障是做好采访工作的前提。捉襟见肘的采访经费，让工作人员难免“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之慨。由于疫情原因，近几年轻费逐年下降。随着疫

情结束、经济好转，应该争取购书经费的数量恢复疫情之前的水平、甚至逐渐增加。同时，也要积极开拓渠道，利用各种基金会等，拓宽经费来源渠道。

第二，大力褒扬捐赠义举。正如前述，捐赠是采访的重要渠道。通过捐赠入藏文献，不仅可以节省有限的购书经费，而且还能够入藏不少珍贵且不易获得的文献。因此，对于捐赠者的捐赠义举，应该通过多种渠道，加大力度进行宣传，加以褒扬。当下的捐赠者和馆史上的捐赠者，都要予以褒扬。褒扬的方式，可以是组织召开座谈会、学术研讨会，也可以是举办展览、编辑出版相关纪念专栏、纪念专辑等。

第三，增加外出访求频率。采访，顾名思义包括采集和访求两层含义，前者指搜集文献信息，后者指外出访求文献。目前古籍馆的采访还是以被动为主，主动出击、有目的地外出访求的次数少之又少。尽管现在信息传递高速发达便利，但是，笔者以为，经常性地外出访求还是十分必要。这不仅有助于加强与书主藏家的联系，也能够及时了解各地古籍特藏的市场情况。古籍特藏文献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作为图书馆人，有责任、有义务通过做好采访工作，保护好、传承好这些重要的文化财产，从而赓续历史文脉、增强文化自信。